以语行治：语言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与路径研究

胡悦

朱萌[[1]](#footnote-1)

**摘要**：语言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治理是维护政治与文化统一、增强国家认同、保障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然而，对于认知语言治理的理论架构尚未搭建完成。 为实现对语言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认知，本文运用系统功能类型学方法，梳理语言在国家治理体系三个不同层面的贯通治理功能、阐明语言治理对国家、群体和个体的根本性与统合性作用。 进而，在综合前沿政治语言学研究基础上，提出语言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三条实践路径。 最后，针对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城市治理、新媒体治理和共同富裕等核心治理领域，讨论语言治理在解决现实治理挑战、丰富治理场景、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上的重要功用，并为新时期语言治理方向与策略提出建议。 本文总结，语言治理事关国家政治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可保障国家政策得以顺畅运行、有效运行、高效运行、合法运行的治理手段。

**关键词**：语言治理；国家治理；群体治理；个体治理；系统功能类型学。

# 引言

语言，是人类的根本特征，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走向、制度设置、价值塑造都具有关键性作用([Marx & Engels, 1961](#ref-MaKeSiEnGeSi1961); [Mead, 2012](#ref-Mead2012))。 这一点在政治领域也不例外。 语言从古至今都是政治生活的核心载体以及塑造政治认知的重要途径([王春辉, 2020b](#ref-WangChunHui2020a))。 政府正是通过对词汇和理论的解释，将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进行阐释，以便服务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Miller & Rose, 1990](#ref-MillerRose1990))。 在政府治理实践中，语言不仅是实现政府间政策扩散的工具、更是推动政策落实和搭建政民互动的基础媒介。然而，现有研究多将语言作为视为一种针对语言环境的公共政策工具，分散探讨语言对社会或个体的直接影响，将语言治理效用仅限于调节民族关系、解决人口融入等具体议题上（比如, 武小军 ([2013](#ref-WuXiaoJun2013));戴曼纯 & 朱宁燕 ([2011](#ref-DaiManChunZhuNingYan2011));刘华夏 & 袁青欢 ([2017](#ref-LiuHuaXiaYuanQingHuan2017))。对语言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合性、遍及性和间接性作用关注不够。基于此，本文运用系统功能类型学方法，梳理语言在国家治理体系三个不同层面的贯通治理功能、阐明语言治理对国家、群体和个体的根本性与统合性作用，表明语言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和必要性。

当前，深化改革的总任务和提高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目标都对政府治理的综合性和高效性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李宇明, 2018](#ref-LiYuMing201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语言文字工作要服务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陈贽, 2015](#ref-ChenZhi2015))。 2016年，国家语委首次将国家语言治理写入《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并提出，要实现语言治理与国家治理相适应。2020年10月，我国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上提出要 “推进语言文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此，如何精准传达政策信息、把握政治方向，如何掌握网络话语权，如何搭建高效政民信息互通，都是新时期政府完善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而这都与语言使用及其使用者息息相关。

面对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挑战，理解语言治理的功效及其应用场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愈发迫切。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系统功能类型学（systemic functional typology）视角，对语言治理在国家、群体和个体层次上的治理效能进行系统性论述。本文认为语言治理对增进国家认同、促进群体团结和稳定个体政治心态具有贯穿性、统合性和间接性作用，进而提出语言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三条路径。最后，结合新时期的发展需求与现有挑战，本文丰富了语言治理在我国城市治理、新媒体治理以及共同富裕中的应用场景，为进一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良性发展和制度建构提供借鉴。

# 语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效与角色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与思维符号体系，是传递信息与价值，交流思想与情感的重要工具，是凝聚国家认同、承载社会文化、提升个体认知的有效途径。不同学科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其功能和作用给予了各种不同的阐释： 经济学家将语言技能视作一种经济优势([Liang et al., 2018](#ref-LiangEtAl2018))，强调语言对个体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 社会学家突出语言的个人性与社会性([Mead, 2012](#ref-Mead2012))，侧重语言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 政治学家则认为语言与国家构建息息相关([Benedict, 2005](#ref-Benedict2005))。 本文延续政治学脉络，结合系统功能类型学方法与国家治理的政治视角，对语言治理效能进行分析，阐明语言规划作为一种公共制度和公共政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同层次上的贯穿性和统合性功效。

## 语言与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为主体在一国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以便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国家利益、实现社会团结([何增科, 2014](#ref-HeZengKe2014))。 语言则是影响国家治理有效性和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性因素：政治生活中，国家通过合理安排语言政治权力，实现语言政治权力的善治，故语言治理必须体现政治立场和政治高度 ([Hu, 2020](#ref-Hu2020b))。 具体而言，语言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国家通用语和语言结构设定两方面。

国家通用语言对于加强国家整合和塑造民族认同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国家记忆和文化的主要载体，国家通用语一直以来受到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和争相推广。国族的共同记忆、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等要素的维系和传递，都需要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基础([Anthony, 2002](#ref-Anthony2002))。国家通用语言的掌握不仅消除了各地区和各民族因语言差异带来的不安，消弭了地域保护主义，还推动了共同体的建立，从而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张卫国, 2020](#ref-ZhangWeiGuo2020); [黄少安 & 王麓淙, 2020](#ref-HuangShaoAnWangLuCong2020))。从秦始皇统一文字到孝文帝“断北语，从正音”，从明代《洪武正韵》到清代“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从民国的“国语运动”到新中国推广普通话、修订汉语拼音等。波澜壮阔、传承延绵的中华语言治理历史无不表明了语言是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对象和构成要素。

语言治理协调国家通用语和地方语言的结构性紧张关系。地方语言是历史和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地区交流和文化认同功能。从语言功能角度来看，交际便利与否是语言使用的关键因素，对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来说，国家通用语言的便利性对很多时候低于方言和民族语言([刘华夏 & 袁青欢, 2017](#ref-LiuHuaXiaYuanQingHuan2017))。而且就治理角度而言，方言和民族语言也有助于加强政策宣导效果，增进官民沟通效率，提高地方治理绩效。研究表明，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仍较多使用方言交流，因而采用本地人说本地话讲本地事的方法，更有助于政策的传达和民众的理解 ([Hu & Pizzi, 2022](#ref-HuPizzi2022))。 然而，尽管方言有助于本地民众沟通交流，但方言之间却难以对话。面对我国内部语言方言差异巨大的客观事实，语言沟通阻碍了地方政府顺利开展工作，引发的语言服务需求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汉语为例，不仅可以划分为官话、晋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赣语、湘语、徽语、平话和土话等十大方言，还可进一步细分为97个方言片，101个方言小片，这些十里不同音的零散片区不仅导致同一政策难以进行跨区域沟通，还会形塑不同方言之间的权利紧张关系(刘, 2021)，无助于国家主流语言的向心力。因此，只有实施合适的语言治理策略，既推广国家通用语，又在治理实践中灵活运用方言，才能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属地与跨地域治理的双高效目标。

## 语言与群体治理

语言的国家治理功效主要从宏观角度出发，着力于塑造政治秩序和提升治理效率。 在中观层面，语言治理同样具有群体治理功能。 群体治理突出民众的自我管理能力，强调在没有政府的参与下，利用群体间的自我协作、社会交往以及非正式协议等自治手段，通过自下而上的权力运作方式来管理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Ostrom, 2015](#ref-Ostrom2015))。根据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个体通过人际互动塑造群体利益（shared interests），而语言对于满足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的紧迫需求，在更广泛意义上团结松散的民众，形成集体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Henri Tajfel & John Turner, 2004](#ref-HenriTajfelJohnTurner2004))。

语言是厘定文化群体（cultural communities）边界的核心指标。人类社会自古以来最简单也是最有效表明自己身份和判断他人身份的手段就是语言([王克非, 2011](#ref-WangKeFei2011))，因语言而划定的群体边界，促使人们在心理和文化上对“我者”与“他者”做出判断。具体而言，人们在听到某种特定语言后，会对语言使用者产生一些直观感受和印象([刘虹, 1993](#ref-LiuHong1993))，从而对不同种类的语言使用人群产生不同的情感和态度差异。 如，刘华夏 & 袁青欢 ([2017](#ref-LiuHuaXiaYuanQingHuan2017)) 基于对不同个体语言能力差异的研究表明，语言差异会影响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甚至会形成心理隔阂，从而造成社会认知和社会判断的固化。国外移民研究也表明，语言是社会融合的前提条件，是正式进入移民社会的必要条件，持有不同语言的移民会遭遇来自主流社会的敌意和排斥，因而由自身母语方言到当地方言的转变被看作是移民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的关键标志([Dustmann & Fabbri, 2003](#ref-DustmannFabbri2003); [Rendall et al., 2010](#ref-RendallEtAl2010))。在这一意义上，对通用语和流行语的掌握程度也就塑造了社会个体对于主流社会的融入程度([Vroome et al., 2013](#ref-VroomeEtAl2013))。

## 语言与个体治理

个体治理包含“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两个层面(Giddens, [2000](#ref-Giddens2000))，前者强调对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的争取，后者侧重于对社会认同和自我实现的追求。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个体的话语表达、经济活动、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等空间被逐渐释放出来，个体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以及竞争意识也日益增强。这一改变导致传统社会对个体治理的运作路径面临极大挑战，以个体利益和个体成就为导向的价值追求促使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来的集体化治理模式和治理框架逐步瓦解([洪波, 2018](#ref-HongBo2018))。 而语言作为重要的资本符号，能够伴随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到资本转换中，对个体能力和个体认知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实现对个体的治理([英吉卓玛, 2018](#ref-YingJiZhuoMa2018))。

就个体能力而言，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工具，在信息传递上具有价值、效用、成本和收益等经济特性。社会语言学表明，掌握一门语言能够有效提高个体的信息获取能力，进而享有更多的公共资源和发展机会([张卫国, 2011](#ref-ZhangWeiGuo2011))。一种语言掌握越好，信息沟通成本越低，信息收益越大，个体也就更容易了解与掌握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和惯例。实证研究显示，语言水平相对较高的人群由于交流障碍更少，拥有更好表现自身能力的交流工具，因而更受人才市场青睐，也更能适应现有生活环境，攀升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其个人社会定位也更为稳定([张卫国 & 孙涛, 2016](#ref-ZhangWeiGuoSunTao2016))。

从个体认知来看，语言塑造自我认知，人们的自我定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与他人接触后的内省([Mead, 2012](#ref-Mead2012))。 个体对于主流语种掌握能力越突出，交流成本越低，在拓展人际网络时遭遇的阻碍越少，其社会融入便会更加顺畅，因而对自身和社会的评价也就越高。 当一个人擅长并非所有人都掌握但又普遍认同某种语言时（如一种通用语），语言就成为证明其能力的依据；语言掌握程度越高，其自我认同也就越强。 譬如，祁虹 & 黎宏 ([2004](#ref-QiHongLiHong2004)) 对语言学习者自我认知的研究表明，语言能力的提高对个人自信心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更进一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习者不仅内化了语言能力，还在与目标文化的交互中完成意义建构和意义生成，从而实现了自我建构和自我评价的提高([苏芳, 2020](#ref-SuFang2020))。

# 语言治理的实现途径

上文从系统功能类型角度梳理了语言治理从国家到社会再到个人的纵贯性、多层次影响。 而作为治理决策者和执行者，如何切实实践语言治理，最大化其治理效能呢？ 针对语言治理的三种功能，存在三条实践路径：阐释政策规范、调整群体关系和改善个人发展环境：

## 阐释政策规范

语言规划体现出语言生活领域的国家意志，是国家在语言生活领域的治理方案。 语言规划不仅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认知、社会融入程度以及社会参与意愿具有导向作用，还直接影响着民族关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因此，国家通常会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进行干预与管理，通过立法或者政府调节手段，使语言文字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戴曼纯 & 贺战茹, 2010](#ref-DaiManChunHeZhanRu2010))。

语言是最重要的信息载体，直接影响国家政策的上传下达。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成为最宝贵的生产要素，民众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主体；通过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政府部门既可以及时传达和阐释相关政策，也可以获取民众对治理的实际需求和满意度，进而增强政府回应性。因此，作为信息载体，语言促进了国家治理的上下沟通，确保各级政府和各类人群所需信息得以顺畅、有效传递。

语言规划作为治理工具承载着政府对价值取向和治理模式的贯彻，治理理念的差异化产生了语言规划的多样化([马戎, 2004](#ref-MaRong2004a))。比如，非洲新兴独立国家领导人在构建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过程中，就十分注重语言规划在族群意识、国家身份和经济发展等多个层面对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影响([Laitin, 1977](#ref-Laitin1977))。因而，各国政府都努力促进语言规划的本土性转化，在立足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语言结构及其使用进行总体规划，充分发挥不同语言在不同场域的功能，以便推动本国民族融合、加强国家认同。

## 调整群体关系

语言平等是族群平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之一，国家通过规定各族群使用的词汇和语言，借此改变不同族群的交际行为，以便加强各族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感方面的联系([Kathryn & Kendall, 2017](#ref-KathrynKendall2017))。 一直以来，语言政策作为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不断强调语言政策要体现出少数族群的“心理状态”，达到维系民族团结的目的。 如，1968年美国《双语教育法》的通过便是承认美国语言多元化的事实，承认存在一些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或成人），这一法律的颁布部分地解决了多族群间的语言矛盾和语言冲突，维护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瑞士，该国规定国内所有的族群语言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高中生均要学习三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孟红莉, 2010](#ref-MengHongLi2010))，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瑞士被认为只是一个“具有文化差别性”的社会，而非一个“多数族群－少数族群共存”的社会，从而避免了族群差异以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实现了多民族社会的稳定团结。

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是实现群体平等的重要途径。语言具有文化象征和交流沟通的双重属性。前者带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情感色彩，后者则强调语言作为交流与学习的工具性手段。部分群体过分强调民族语言在国家社会和公共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语言成为某种特殊的族群象征，演变成具有特殊实用意义的工具，最终造成民族隔绝的非意图后果([马戎, 2017](#ref-MaRong2017))。 因此，在政治平等的意义上解决了各族群语言问题的合法性后，国家必须从应用性角度出发，注意构建以普通话为主、以方言或族群语言为辅的和谐语言生态（王春辉 2021），利用市场经济逐步推动共同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打造在经济层面上降低成本、加强合作的政治地理区域。

## 加强个体治理

话语是构建民众世界观和概念化政治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人们的思维依赖于框架、隐喻、意象等语言和认知手段([Mead, 2012](#ref-Mead2012))，对于同一客观事物，不同的语言表达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从而演绎出不同的游戏规则和行事逻辑。因此，国家可以通过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话语的生产，借用语言符号来把握微观个体的具体话语行为，潜移默化地加强语言与个体身份的良性构建，从而实现对个体心理的有效引导。 当前，随着新信息技术和电子媒介的出现，政府通常将媒体作为实现言语交际和经验表征的工具，根据政治需要或意识形态的准则来选择、建构和处理新闻话语和图像，以便合法化政府行为。

语言不仅是信息交流的媒介，更是价值与立场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国家通过多模态话语，即语言文字和图像的复合话语来构建社会中的人际互动，利用各种符号模态协同共同引导民众心理。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多元化的感官渠道来获取信息和建构话语，出现信息交流的“多模态转向”，既包括直观的语言符号，也包括影视图像等非语言符号。然而，任何符号资源都必须根据特定的国家治理目标进行生产、调试、重塑与再建构，使其符合话语制造者的利益并与整体国家治理体系兼容。作为重要的话语意义资源，多模态话语通过诉诸个体不同的感官渠道增强了国家话语建构的的动态性与情境性(王小平 & 王军, 2019)，

语言治理通过阐释政策规范、调整群体关系、加强个体治理三种实现途径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有机统一的语言治理体系，不仅维护了国家稳定、加强了群体团结、促进个体发展，还从不同方向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了良好政治秩序的建立和延续，具有长期且深远的影响。

# 语言治理在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应用场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双重变革时期，对国民政治社会心理产生巨大影响，相应一系列问题也随之凸显。 如，由于经济结构剧烈变化而导致的国民自我定位错位([景怀斌 et al., 2017](#ref-JingHuaiBinEtAl2017))，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加速城镇化带来的人际信任缺失和新老市民身份认同矛盾([卢晖临 & 潘毅, 2014](#ref-LuHuiLinPanYi2014))，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与政府治理方式不匹配所导致的参与爆炸([郝宇青 & 车跃, 2011](#ref-HaoYuQingCheYue2011))，这些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处理不当，极易造成民众情绪激化，甚至演变成恶性群体事件，损害社会稳定，威胁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

然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语言距离和语言区隔密切相关，语言具有强烈的社会识别功能，对于打破群体隔阂，促进社会公众的心理融合具有重要作用。上述问题迫切需要国民加快融入主流社会的速度，这就要求其具备较好的沟通能力和语言文字应用水平。我国语言治理也由此借助上述三种实施途径，丰富了语言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应用场景，呈现出了独特的治理面貌。

## 城市治理

在新时期国家治理与城市治理理念的推动下，城市语言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步成为城市研究的新任务。以往关于城市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武小军 & 杨绍林, 2014)，强调语言在个体层面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武小军, 2020)，忽视了语言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作用。然而，城市语言治理包括常态性问题和应激性问题两部分，如何处理好语言与社会、语言与人际、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实际上是当前城市治理和区域发展的新痛点和新难点。

从常规性问题来看，城镇化的飞速发展促成了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国内出现大量进城农民工和城市新市民，伴随着人口流动带来的语言接触与融合，造成语言地图的剧烈变更。然而，语言地图变更的实质是方言与其所蕴含的文化记忆所经历的极速变异过程，这一过程最终产生了新的语言变体，或是在当地语言之外形成了孤僻的方言岛([武小军, 2020](#ref-WuXiaoJun2020))，大量人群也由此陷入了失语、失权和失利的悲惨局面。这一局面的出现使得语言在城市治理中的协调与中介价值更加凸显。传统治理视角提出，对于城市主体人群和新进人群/少数人群的隔阂与矛盾，可以通过增强后者的社会融合度（比如农民工的城市化程度或少数民族的融入感等）加以改善。因此，现有政府正在通过语言治理促进社会公众心理融合，提升全体公众人际信任和积极心态，为营造和谐社会氛围搭建心理基础，实现普通话、方言和外语的和谐共生，助力新型城镇化人本目标的实现。

就应激性问题而言，公共卫生危机促使城市语言治理能力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沈骑, 2021](#ref-ShenQi2021))。 2020年上半年，我国大城市疫情防控工作中就暴露出一系列涉外语言能力不足以及涉外语言治理空白等问题：当前国内大城市仍未建设语言人才资源数据库和语言志愿者信息库，导致政府多语信息发布和服务渠道的社会影响力和可及性大打折扣，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的语种规划与多语意识有待提高；不仅如此，城市的语言翻译和语言服务中对外语种的设置和提供也缺乏深谋远虑，面对大量在华外国人，尚未形成有效的语言服务协调机制和语言治理体系，各类事务仍然由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的机构或基层组织自身来解决，缺少有效的合作治理机制，从而严重影响了城市在突发重大事件中的涉外应对能力。

这些问题都提醒我们，我国大城市语言治理能力亟须提升，后疫情时代城市化建设中纷繁复杂的语言治理问题需要更加引起重视，从而能够在解说和宣传国家政策时及时、正确、有效传递信息，促进官民间、地区间、国内外的交流，讲好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

## 新媒体治理

媒体是现代社会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作为宣传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重要窗口和践行者，是国家语言规划的关键领域([陈丽湘, 2021](#ref-ChenLiXiang2021))。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轮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移动应用、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应用、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国内新媒体用户数量的激增和信息传播能力的突显正全方位地重塑媒体格局和社会生态([唐绪军 et al., 2019](#ref-TangXuJunEtAl2019))。这一新态势和新格局使得媒体的语言文字行为具有更广阔的社会示范效应，其巨大的活跃性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语言文字的生态，给新媒体语言治理带来了新问题。

此前，规范用字用语是我国对新媒体实施语言治理的核心议题。 现有政策也主要从社会用字角度，围绕核心议题的“新媒体语言文字使用规范性”来开展，强调语言使用对个体的直接性影响，重点规划和解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方言使用以及新词新语规范等问题([陈丽湘, 2021](#ref-ChenLiXiang2021))。 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规范报刊单位及其所办新媒体采编管理的通知》（2017）、《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2017）等专门性法律法规均强调“新兴媒体不仅要发挥充分语言的吸引力和传播力，也要发挥语言文字对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环境的重要作用”。 这些具有针对性的语言规划确实为我国新媒体行业的语言文字使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规范。

然而，信息技术的变革使得新媒体的语言影响力正在超越传统媒体，新媒体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同时，其自身也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环([李松林, 2021](#ref-LiSongLin2021))。网络直播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强势崛起造成每位用户成为信息来源和传播媒介，每部手机都是制造网络新闻和产出舆论的平台，新媒体的低准入门槛导致传播内容良莠不齐、传播消息真假难辨。因此，语言治理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规划引导(李宇明, 2018)，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媒体自觉；既需要提高信息上传下达的速度和数量，又要提高信息传递的质量。现有以传统媒体作为治理手段的个体性语言政策，必须更多关注新媒体时代的语言和语言生活，积极统筹各方力量，使政府、社会、公众形成治理共同体，加强各主体之间的督促、衔接和协调，实现媒体语言治理的资源整合和力量融合，系统探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构建新媒体治理格局。

## 共同富裕

一直以来，学界对语言与贫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王春辉, 2019)，强调语言能力是个体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农村人口获得更多更好的求学和就业机会，是实现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张卫国, 2020)。然而，新时期下乡村振兴覆盖区域更广、时间跨度更长、目标维度更全，它不再只是从经济层面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而是一次以人才振兴为抓手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的系统性建设(银晴等, 2022)，通过将语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职能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有机结合，实现全社会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首先，以语言技术赋能物质富裕。 作为一种基础性数据，语言文字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之一([李宇明, 2021](#ref-LiYuMing2021a))。 智慧语言教学、智能翻译等技术不仅推动了语言学习和使用方式的变革，而且增强了村民适应新业态的语言传播能力、语言信息处理能力、语言的自我管理能力(姚欣 & 杜敏, 2021)。如，通过鼓励和支持各地筹建本地语言文化资源库和语言博物馆、建立地方语言资源平台、举办方言微电影、推动以图、文、音、像、影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和利用我国语言方言文化资源，拓展了语言技术的应用场景和应用深度，从而促进了语言新业态的产生和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了将语言能力的提升与村民的全面发展相结合，最终夯实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其次，以语言传承推动精神富裕。中国优秀语言文化的传承创新有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王春辉, 2020a](#ref-WangChunHui2020b))。但近年来语言文字使用和表达不规范现象仍较为常见(刘泾, 2018)，以致语言本身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和优秀文化信息传递不到位或传递了错误信息。因此，语言策划要兼具宣传教育和审美功能(银晴等, 2022)，促使优秀语言文化进一步融入当代语言生活，丰富当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精神营养和价值意涵，从而培养精神富足和文化浸染的社会土壤。

语言助力乡村振兴是系统性和长期性的，是直接和间接作用相结合的，必须规划先行、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对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本身功效的发挥都增添了更多的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推普脱贫”彰显其工具性的语言扶贫功能外，国家仍需不断丰富语言治理的内涵，不断克服语言因素对乡村地区全面发展所产生的阻碍，即需要提高农民个体内生性的发展能力，也需要推动乡村地区语言文化的振兴，语言生态的保护和语言资源的开发，做好共同富裕的“语言文章”，真正实现乡村的人才振兴、组织整振兴、文化振兴和产业振兴。

# 总结与讨论

本文从语言政治学视角阐明语言公共政策对国家治理、群体治理以及个体治理的重要性，揭示出语言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系统性、间接性和广泛性影响，为我们在较大范围内从事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本研究归纳了语言治理的三种实施途径，即阐释政策规范、调整族群关系以及加强个体心理引导。 虽然有关研究已为语言学和教育学学者所关注，但本文从政治学角度出发提供了有关语言治理的实现机制，体现了基于语言功能的不同治理策略，为思考如何切实实现民族平等、有效引导公民参与、降低治理难度提供了新思路。 本研究从城市治理、新媒体治理、共同富裕三个方面系统地探讨了语言治理与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丰富了语言治理在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应用场景，有助于加深对语言政治和语言规划的理解，为制定合理的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提供借鉴，在学术和治理实践上都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坚持党的领导。 语言治理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政治调控过程，其中包含对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中国实践的全面把握，包括对各个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的动员组织，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任务，只有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制定正确的语言规划和发展战略，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稳定政治秩序，实现语言治理现代化。

其次，服务于国家总体目标。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应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总体理念和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本研究揭示，语言安全不仅是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对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具有重要影响。这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地研究公众语言规划（包括公众外语政策、民族语言政策）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探讨语言规划有效促进国家治理的可能形态，使语言规划更好地为国家总体目标的实现服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更多力量。

再次，注重群体身份塑造。语言是最重要的群体属性之一，能够凝聚和强化群体意识，增强群体认同感。 当前，社会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各群体对公共资源、国家机构，特别是语言规划控制权的争夺日益激烈，极其容易引发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秩序稳定。国家治理需要注重语言对群体身份的塑造作用，运用语言治理“润物细无声”的调控功能，对民众心理状态进行潜移默化而又具有持续性的调整和培养，调节个体社会成员的自我定位和人际关系，促进群体间的心理融合，避免话语冲突引起严重的政治冲突。

最后，明确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和效果。 对于中国这个多方言国家来说，普通话是进行现代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语言工具，但过分推行通用语将会使得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式微，导致语言治理效果随之降低，尤其在地方意识或族群文化比较浓厚的地区。不仅如此，目前推广普通话只是聚焦于语音、语调层面的推广([鲁子问, 2008](#ref-LuZiWen2008))，国民是否能从语义这个根本目的上理解通用语治理与方言保护之间的非对立性有待考察。这要求我们明确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和效果，妥善处理推行通用语与保护地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平衡建立低成本交流环境与合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的关系，切实保障语言权利，解决语言问题，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 参考文献

Anthony, S. (2002).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龚维斌 & 良警宇, Trans.). 中央编译.

Benedict, A. (2005). *想象的共同体* (吴叡人., Trans.). 上海人民出版社.

Cook, T., & Liu, A. (2016). Using Linguistic Networks to Explain Streng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orld Development*, *87*, 128–138.

Cummings, M. (2019). Developing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Word*, *65*(2), 135–138. <https://doi.org/10.1080/00437956.2019.1615708>

Dustmann, C., & Fabbri, F. (2003).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s in the UK. *The Economic Journal*, *113*(489), 695–717. <https://doi.org/10.1111/1468-0297.t01-1-00151>

Giddens, A. (2000). *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 Trans.). 译林出版社.

GuoWen, H. (2007). Aims and principles for systemic functional syntax analysis.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3*, 39–45.

Halliday, M., Brown, T., & McIntosh, A. (1964).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62*(1), 10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0196760_The_Linguistic_Sciences_and_Language_Teaching>

Henri Tajfel, & John Turner. (2004).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p. 293). Psychology Press.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505984-16>

Hu, Y. (2019). Refocusing democrac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framing strategy in political language: Democratization. *Democratization*, *27*(2), 302–320.

Hu, Y. (2020). Refocusing Democrac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Framing Strategy in Political Language. *Democratization*, *72*(2, 2), 302–320. <https://doi.org/10.1080/13510347.2019.1690461>

Hu, Y., & Liu, A. H. (2020). The Eff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on Public Attitud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 1), 1–23. <https://doi.org/10.1017/jea.2019.41>

Hu, Y., & Pizzi, E. (2022). Breaking Through the Linguistic Barrier: The Role of Language Policy in Migration Decision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thcoming.

Kathryn, S., & Kendall, K. (2017).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In *The Handbook of Linguistics* (pp. 655–673). John Wiley & Sons, Ltd. <https://doi.org/10.1002/9781119072256.ch33>

Laitin, D. (1977). Politics, Language, and Thought: The Somali Experience. *American Ethnologist*, *5*(4), 797–799. <https://doi.org/10.1525/ae.1978.5.4.02a00130>

Liang, H., Marquis, C., Renneboog, L., & Sun, S. L. (2018). Future-Time Framing: 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Corporate Future Orient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29*(6), 1093–1111.

Liu, A. (2015). *Standardizing Divers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Regim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iu, A., & Pizzi, E. (2018). The Language of Economic Growth: A New Measure of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8. <https://doi.org/10.1017/s0007123416000260>

Marx, K., & Engels, F. (1961).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Trans.). 人民出版社.

Mead, G. (2012). *心灵、自我和社会* (霍桂桓, Trans.). 译林出版社.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0771031/>

Miller, P., & Rose, N. (1990). Governing economic life. *Economy and Society*, *19*(1), 1–31. <https://doi.org/0.1080/03085149000000001>

Ostrom, E. (2015). *公共资源的未来：超越市场失灵和政府管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 (郭冠清, Trans.; 第1版 ed.).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ndall, M., Tsang, F., Rubin, J., Rabinovich, L., & Janta, B. (2010). Contrasting Trajectories of Labor-Market Integration Between Migrant Women in We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 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 *26*(4), 383–410. <https://doi.org/10.1007/s10680-010-9214-x>

Vroome, T., Hooghe, M., & Marien, S. (2013). The Origins of Generalized and Political Trust among Immigrant Minorities and the Majority Popul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1336–1350. <https://doi.org/10.1093/esr/jct018>

Wright, S., & Taylor, D. (1995). Identity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Classroom: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Heritage Versus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on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7*(2), 241–252. <https://doi.org/10.1037/0022-0663.87.2.241>

丁建新, & 杨荟. (2020). 作为“他者”的病毒:关于新冠肺炎隐喻的话语分析.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04), 107–112.

何增科. (2014). 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01*, 11–15.

刘华夏, & 袁青欢. (2017). 边疆语言治理的挑战与转型. *广西民族研究*, *06*, 8–15.

刘虹. (1993). 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和语言变化的影响. *语言文字应用*, *03*, 93–102.

卢晖临, & 潘毅. (2014).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文化纵横*, *5*.

唐绪军, 吴信训, & 黄楚新. (2019).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9）* (No. No.10).

孟红莉. (2010). 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五种类型分析. *西北民族研究*, *1*. <https://doi.org/10.16486/j.cnki.62-1035/d.2010.01.026>

张卫国. (2011). 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综述. *经济评论*, *04*, 140–149.

张卫国. (2020). 普通话能力的减贫效应:基于经济、健康和精神维度的经验分析. *语言文字应用*, *04*, 37–51.

张卫国, & 孙涛. (2016). 语言的经济力量:国民英语能力对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影响. *国际贸易问题*, *08*, 97–107.

戴曼纯, & 朱宁燕. (2011). 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为例. *欧洲研究*, *29*(02), 115-131+160-161.

戴曼纯, & 贺战茹. (2010). 法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实践——由紧到松的政策变迁.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18*(01), 1–5.

景怀斌, 傅承哲, & 许晓丽. (2017). 民众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状况及作用机理. *青海社会科学*, *6*. <https://doi.org/10.14154/j.cnki.qss.2017.06.016>

李宇明. (2018). *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5*.

李宇明. (2021). 试论个人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 *语言文字应用*, *03*. <https://doi.org/10.16499/j.cnki.1003-5397.2021.03.001>

李松林. (2021). 探析新媒体治理格局. *记者摇篮*, *07*, 49–50.

武小军. (2013). 流动人口的语言接触与语言认同. *语言教学与研究*, *06, 06*, 104–109.

武小军. (2020). 语言适应与社会顺应——语言视域下对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思考.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9*(05), 91–99.

沈骑. (2021).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语言研究的三大取向. *语言战略研究*, *6*(3).

洪波. (2018). “个体—共同体”关系的变迁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浙江学刊*, *02*, 82–89.

王克非. (2011). 外语教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 *外语界*, *01*, 2–7.

王春辉. (2019). 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 *语言战略研究*, *4*(01), 12–21.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19&filename=YZLY201901007&v=>

王春辉. (2020a). 后脱贫攻坚时期的中国语言扶贫. *语言文字应用*, *3*. <https://doi.org/10.16499/j.cnki.1003-5397.2020.03.003>

王春辉. (2020b). 论语言与国家治理.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2*(03), 29–37.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0&filename=YNSF202003006&v=>

田学军. (2019). 聚焦推普脱贫 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全面发展. *语言文字报*, 001.

祁虹, & 黎宏. (2004). 外语学习中的情感因素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06*, 404–406.

苏德. (2004).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综述.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1*, 1–6.

苏芳. (2020). 语言、教育与文化耦合:布鲁纳语言建构观的本质内涵及启示. *教育与教学研究*, *34*(09), 18–28.

英吉卓玛. (2018). 青海藏区藏族学生语言能力与个人发展关系个案考察. *语言战略研究*, *3*(05), 40–45.

郝宇青, & 车跃. (2011). 怨恨情绪及其化解:必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探索*, *04*, 70–76.

陈丽湘. (2021). 政策网络视域下的媒体语言治理初探.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6*, 39–43.

陈贽. (2015). 习近平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 *新华网*.

马戎. (2004). 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 *西北民族研究*, *01*, 20–44+147.

马戎. (2017). 汉语学习与中国少数族群的现代化. *社会政策研究*, *01*, 110–124.

鲁子问. (2008). 国家治理视野的语言政策. *社会主义研究*, *06*, 54–58.

黄少安, & 王麓淙. (2020). 民族地区语言扶贫的经济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 *语言文字应用*, *04*, 26–36.

1. 胡悦，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朱萌，通讯作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项目（72004109）“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老市民身份认同建构的社会心理机制与政策引导路径研究”研究成果。 [↑](#footnote-ref-1)